



『文明以止』：

中华民族的
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

- ◆ 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 ◆ 诸子百家：中华文明的精神轴心与自我诠释
- ◆ 三纲五常：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人文精神
- ◆ “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
- ◆ 再论“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林存光 / 著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11ZAB006)



『文明以止』：
中华民族的
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

林存光 / 著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 /

林存光著. —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6

ISBN 978 - 7 - 5147 - 0643 - 7

I. ①文… II. ①林…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精神—
研究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7209 号

“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

“WENMINGYIZHI”; ZHONGHUAMINZU DE RENWEN JINGSHEN YU WENMING TEXING YANJIU

林存光 著

责任编辑：崔建刚

技术编辑：刘 硕

封面设计：天佑书香

出版发行：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 - 66063020 010 - 66061634 010 - 66061646

网 址：<http://www.xuexip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162 千字

版次印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47 - 0643 - 7

定 价：36.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一、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1)
(一) 充分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	(1)
(二) 向往上古三代、推崇周礼的社会 理想与治道诉求	(3)
(三) 面对的时代难题及其问题意识	(6)
(四) 人文学养的传统根基及其对文化 传统的损益转化	(9)
(五) 整理编修六艺的文化贡献	(12)
(六) 对“文化中国”自我理念与文明 特性的凝练与提升	(15)
二、诸子百家：中华文明的精神轴心与自我诠释	(20)
(一) 中国、礼仪文明及其历史反思	(21)
(二) 诸子百家之学的“文明”意涵	(25)
(三) 小 结	(45)

三、三纲五常：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人文精神	(48)
(一) 中华文明演进的普世特性与独特道路	(49)
(二) 中华人文精神的历史演化及其根本特征	(55)
(三) 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三纲五常	(61)
(四) 诠释与批评：一种整体理解的视角	(73)
(五) 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忠义精神	(82)
(六) 走向未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中国文明秩序	(95)
四、“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	(101)
(一) 中华文化的意识特性与思想精华	(102)
(二) “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神特性	(120)
五、再论“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129)
(一) 什么是文明？	(130)
(二) 中、西不同的文明史观与文明特性	(138)
(三) “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162)
附 录	(168)
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	
——评方朝晖《为“三纲”正名》	(168)
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	
——敬答方朝晖教授	(196)
为“三纲”正名之谬	(223)
后 记	(230)

一、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他的整个思想世界就建筑在传统的根基之上，或者说传统直接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世界的根基。因此，我们欲尝试深入了解和阐释孔子的思想世界，首先遇到并需要恰当而合理地加以处理的一个最大的文化难题就是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具体而言，孔子是一位好古敏求的学者，他赋予自身一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文化角色与使命，这使他留给后人一种仅仅作叙述者而一心守护、维系旧传统的保守形象。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保守传统？这一保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他对传统的保守仅仅是一种守旧的行为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的文化诉求？我们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力求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一）充分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

孔子的好古敏求，意味着孔子对自身作为文化传统的远

宗、绍述与传承者角色具备一种充分的自觉意识，体现了孔子本人的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为此，孔子甚至认为自己拥有某种天赋的道德责任或神圣的文化使命，如：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显然，在孔子看来，文化传统的延续与丧失、传承与废弃、复兴与衰落，并不完全受个人的努力与作为所影响和左右，而是最终由上天所决定。对于孔子身处其中的历史生活环境或遭遇到的文化困境，我们完全可以从纯粹世俗的、人类事务本身的视角去作出合理的解释，即在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与人间秩序中真正在起最终决定作用或发挥其支配影响的，是一种能够决定具体人事之兴衰的总体客观情势及其必然趋向，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人们事穷呼天的时候，所谓的“天”或“命”，其真实的含义也许正是指这样一种总体的客观情势及其必然趋向。在上述引文中，那种能够决定斯文之沦丧或失落与否的“天”未必不是暗指着这样一种含义，然而，在更为根本的超越性的意义上，孔子所谓的“天”，作为一种令人敬畏的客观的外在威权，更多地具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性的含义，它明显的是从传统至上神意义上的、具有人格意志的神秘的支配或主宰力量脱胎转化而来，但孔子却将其内化为

一种自觉的文化担当的“天职”意识，我认为这也正是孔子所谓的“知命”、“知天命”的真实含义。

而由上述引文可知，孔子很显然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自觉担负其维系传统、传承斯文之重大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的特殊人物，他的那份其奈我何的自信与达观，无疑一方面是与他对当下情势的一种判断相关，即认为事情还未发展到上天要让斯文丧失殆尽的地步，另一方面更与他植根于对天命的体认与信仰而生发出的一种天命天德在我的自觉的文化担当的“天职”意识密切相关。

正因为孔子深信自己秉承或肩负着一一种天赋的道德指令、重大的历史责任与神圣的文化使命，因此，尽管事情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上天而不是个人的努力，尽管他后来更清醒地意识到“道之不行”的困难与挫折，但他仍然坚持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立场，不计成败、无怨无悔地尽力去维护乃至兴复正在日趋走向衰落废坏的礼乐文化传统。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循守旧”的“好古癖”行为，还是一种值得我们同情的一个知识精英为维护 and 传承自身文化传统而勇于担当、负责任的正当行为？要合理地回答这一问题，还需结合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来综合考量。

（二）向往上古三代、推崇周礼的社会理想与治道诉求

孔子认为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

的时代，时代已堕落到历史灾难的深渊；而他心向往之的则是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古圣先王统治下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化的“黄金时代”。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曾与他那“犹然而材剧志大”的学生子游有过一番对话，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黄金时代”——“大同”、“小康”之世的美好向往。其言如下：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东汉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睦亲也。”唐孔颖达疏曰：“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而用尧舜是也。”），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分），女有归（婚嫁）。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止）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国君传位于儿子或兄弟）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一番社会理想的畅想曲，格外地美好而动人视听。尽管有怀疑并非真出自孔子之言者，但即使说《礼运》篇的作者只是假托孔子之口而发表自己的心声，大体说来，这一对社会理想蓝图的构想毕竟是合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真意”的。所谓的“大同”、“小康”之世也正是分别以传说中被理想化了的上古尧舜时代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初的“盛世”为历史蓝本的。

孔子之所以如此称述上古三代的圣王之治，显然并不是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而采取的一种说服策略，更非单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认为它们对后人特别是对执政当权的统治者来讲具有规范性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朱熹《集注》所言，“祖述者”乃旨在“远宗其道”，而“宪章者”旨在“近守其法”。而如果说远宗尧舜之道显得理想太过高远的话，那么孔子则更愿意考求三代之礼、学修文武之道、近守文武之法，这不仅仅是退而求其次，而且这在孔子看来也更加现实可行^①。因此，孔子虽然盛赞尧舜，远宗其道，追寻上古圣王的足迹，但他却将自己的梦想最终落脚在维系斯文

① 有学者认为，“通过‘大同’、‘小康’的对比，《礼运》的作者强调，天下为公、权力公有是公正、合理的，而天下为家、权力私有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梁涛：《论早期儒学的政治理念》，见《哲学研究》2008年第10期，第49—50页）。然而，根据孔子阐述完大同小康的理想之后而与子游之间关于“礼之急”的问题所作的进一步对话来看，大同与小康显然并没有公正与不公正、合理与不合理这样的二分对立的含义，相反，孔子是在认可这两种社会理想同样合理的前提下更急于追求以礼治世而实现小康之治境。个别学者的上述结论，大概是只读了半截子书就根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偏好而凭“主观印象”得出来的吧。

（周代礼乐制度文明与文化传统）于不坠乃至兴复周制周道于东方，并自命为文王、周公的当代传人而乐于担当这一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而且念兹在兹，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文明与文化传统推崇备至，崇尚周代礼乐之治与道德教化的治道之方，极言“礼之急”，对“制礼作乐”的周公更是魂牵梦系，所谓“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朱熹《集注》曰：“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所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一言以蔽之，上古三代寄托着孔子对社会理想最美好的向往与追求，以及用于拨乱反正的治道诉求。

（三）面对的时代难题及其问题意识

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我们将孔子追迹三代礼文而“好古敏求”的情结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处境与生活环境中来认识和评价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对于上古三代的文化传统的维护与保守似乎并不像我们有时主观想象的那样具有浓厚的“复古”、“守旧”的意味。如子曰：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

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

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中庸》）

孔子对于文献的不足或缺失，无疑是深感遗憾的，不过，孔子并不是一个无视事实或完全缺乏历史感的人，他从对三代礼文的系统探求与考察中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经过对夏、商两代之礼的鉴取与损益，周代的礼制礼文（即周代的制度文明与礼乐文化）已经趋于完备，故孔子自命以遵奉和维护周代的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为己任。“郁郁乎文哉”乃是孔子“从周”或维护周代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一个根本的或重要的理由，不仅如此，孔子虽然生活在一个周代礼乐制度与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而日趋于解体与衰落的时代，但“周礼”显然还仍旧是春秋时期人们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而对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与作用，正所谓“今用之”，意即周礼仍然是“现在通行的”^①，这是孔子“从周”的另一重要的理由。

从第一个理由来讲，孔子无疑有太过对周礼推崇备至的毛病，以至于在他看来，礼文的沿革只是一种改良性的损益式延

^① 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续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一传统在即将到来的战国之世就要面临走向断裂的命运，故而他还充满信心地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却不知道，在他之后整个时代的发展变革与急剧变化的生活环境和现实状况，仅仅从损益的观点已不可能解释清楚了，正是在发生激变、古今相反不同或“世异则事异”的意识日趋强烈的战国之世，孔子被看作是一个主张“复古”、“守旧”的历史人物而遭到了其他学派思想家（道家和法家）的尖刻的批评。然而，我们既不能苛责孔子为何没有预见到后来时代发展和生活环境变化的情况，也不宜像战国之世的思想家那样指责孔子“复古”、“守旧”，我们还应把孔子本人的“好古”、“从周”与后来孔子后学在他的感召下日趋于“复古”、“守旧”区别看待，因为孔子的“从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今用之”，对孔子而言，他所面对的最大时代性问题是周礼的僭越与破坏，而不是完全地抛弃与废止，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因此，孔子问题意识的重心在于，或者说他最为关注的主要是遵循还是僭越、维护还是背离周礼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周礼作为一种活的文化传统^①，仍然构成孔子所处时代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人们的生活实践与行为

^① 有学者如庞朴先生认为应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作必要的区分，即所谓“文化传统”是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流向；而“传统文化”应是指已经过去的文化，是一个静态的凝固体。这一区分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孔子好古敏求的文化动机及其维护和传承传统的诉求是大有裨益的，孔子所“好”而敏求之的或者他所乐于称“述”之的可以说主要是那种仍然“今用之”而构成为现实生活一部分的“文化传统”，故而我在行文中有意地使用“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一词。

模式发生着实际影响这一点来讲，遵循和维护周礼还谈不上是一种“复古”性的诉求，反之，僭越和背离周礼也称不上是一种真正的革命性的行为，而不过是一种出于“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的越轨行为，不过这种“僭礼”越轨的行为对于当时“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亵渎和叛逆，客观上加速了贵族世袭体制及其礼乐制度与文化传统的解体和崩坏，并为新事物的生长准备着条件，从而“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这正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必然会出现的变革与动荡、新生与破坏一体并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四）人文学养的传统根基及其 对文化传统的损益转化

过去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中汇集着人类成长的故事和集体生活的经验，作为一个“好学”的人文学者，孔子所主要关心的就是如何从中获取可用于认识、了解和改进现实世界的有用的知识与学养，因此，好古敏求便成了孔子获取这种实用性知识与人文学养的主要途径，而上古三代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就构成了孔子所具备的知识与学养的主要根基与内涵。

在对上古三代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进行系统的学习、深度的了解和充分的领悟的基础上，孔子对于自己要继承和传承什么

^① 马克思、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以及传统中的哪些东西需要修正和改进，应该说是有着自己的鉴别、辨识和选择的，譬如：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论语·子张》）

很显然，孔子对上古三代的礼乐制度与传统持一种有所损益、择善而从或综合其善者而从的文化观点，孔子“从周”的基本主张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观点。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孔子虽然主张遵循礼仪，但他所谓的“礼”，如同他同时代的人对礼与仪所作的区分那样（见《左传》昭公五年、昭公二十五年），已非单纯指一种行为规范的外在形式或揖让周旋的仪节，而是更注重“礼之本”或礼的精

神实质，强调遵从古代礼乐文化传统应合乎以仁为本的人道原则，或者说作为主体的人依仁而行的行动的能力对于传承、践习和弘扬古代礼乐文化传统可以发挥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等。

再者，作为一位卓越的人师，孔子要将自己对文化传统的了解与领悟以及身体力行地传承、践习和弘扬文化传统的用意与心得体会传达给学生，他要和学生交流他自己通过学习和思考而获得的对传统之价值与意义的新的理解和认识，那么，他就不可能只是单纯地传述或只是简单地传授关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某种知识，他必然要在传述中赋予文化传统以新的内涵和意义，将新的理解和释义带入关于文化传统的交流与对话的语境当中，而且必须对人们何以应遵从文化传统提出正当的理由和依据，作出合乎情理的说明。如孔子在与其学生宰我讨论应遵循“三年之丧”这一古老礼制的合理性时，强调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并斥责主张缩短丧期的宰我“不仁”（《论语·阳货》）。显然，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的古老礼制，从充分表达和彰显人的伦理情感的角度讲，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另如孔子在与学生讲论诗书礼乐时，主要强调的是其用于修身、治世的道德价值与政治意义，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可见，孔子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对诗书礼乐的文化传统给

予了合情合理的论证和说明，对其价值和意义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作了新的解释，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孔子已“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而是“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①。传统一旦被给予合情合理性的论证和说明，其价值和意义一旦被作了新的解释，那么，它也就不再是“如其所是”的一种“自在”性质的存在于过去的传统，而是在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参与下被转化成一种“自为”性质的活在当下的传统，反之，人的主体性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有着深厚的历史感与传统文化根基的主体性了。总之，传统之为传统，只有经过作为主体的人的学习与领悟、鉴别与选择、修正与改进、损益与完善、论证与释义，它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对人有意义，并构成为人们“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

（五）整理编修六艺的文化贡献

孔子因“述而不作”而致力于经籍六艺的编修整理工作，并因此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卓越贡献，这恰恰奠定和成就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文化伟人的历史地位。

孔子虽然自称好古敏求、“述而不作”，但他并未对好什么、求什么、述什么以及什么叫作“不作”作出明确的具体说明，但综合孔子有关的言论，我们知道孔子的“好古”并非一般意义上旨在“守旧”的喜好，他的所“求”所“述”也非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